

31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1092毫米32开本 5 $\frac{3}{4}$ 印张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1098·6 定价：0.46元

内部发行

编 辑 凡 例

①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任务，本选辑于今年开始出版。本选辑刊印的目的，是在于广泛积累现代史、革命史料，特别是新疆的历史资料，以促进史料征集和撰写工作的开展。所需的史料，要求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身见闻，并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史实和人物等情况，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选辑只在内部不定期印行，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②本选辑的资料，主要是从清末到新疆解放各个时期，各个方面，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工商、民族、宗教、历史人物和社会风尚等史料，不拘体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实、具体。所写史料无论是否与己有关，均应大胆直书，不要曲笔。对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原始资料，如函电、手稿、日记、照片等，均所欢迎。

③由于每个人对历史的经历和见闻，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所写资料仅供研究参考。

④各种文史稿件，凡经本选辑采用者，均发给稿酬，未经采用但有一定参考价值者，也酌付笔墨费用。

⑤本选辑对来稿可以综合、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⑥来稿请直寄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

目 录

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郎道衡（ 1 ）

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

……………金绍先（ 18 ）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疆日报》

……………李帆群（ 74 ）

1932—1934年间南疆事变的回忆

……………张宝新 潘祖焕（ 92 ）

满汉王和多活佛……………通 宝 潘祖焕（ 101 ）

镇压吐鲁番暴动的经过 ……………宋希濂（ 112 ）

关于吐、鄯、托事件……………李帆群（ 131 ）

绥新汽车公司的内幕……………石元璞（ 135 ）

外商在新疆的洋行 ……………通 宝（ 151 ）

张培元事略 ……………王思溶（ 168 ）

我所知道的“新疆王”盛世才

郎道衡

盛世才是辽宁省开原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兄弟共五人。他是老大，二弟盛世英、三弟盛世杰务农。他四弟盛世骥留日，士官学校毕业，一九三三年到新疆，曾任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在团长任内，赴苏留学。五弟盛世骥亦留日未入正式学校。一九三五年，他全家来新疆（四个弟弟、父、母、妹盛世同）。

盛世才字晋庸，在广东韶关讲武堂毕业后（有人说他是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系传说），投入郭松龄部下充连长，为郭及郭的团长邱宗濬所赏识，邱妻以次女邱毓芳。郭为培养其部下深造，以备将来大用，则供给他学费留日，入日本陆军大学。

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后，盛世才以学费无着，转而谋得蒋介石供给学费。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入陆大的仅三个人：一为杨杰，在蒋的参谋本部供职；一为王树常，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三为盛世才，故为蒋所重视，这次有了机会，便慨然允诺，供给学费，以资笼络。

一九二五年前后，开原县留日学生有十余人，计有：徐廉后改名为徐伯达，何语竹后改名为何耿光，程启明后改名为程东白，王立士后改名为王乃中，宋扶摇后改名为宋念慈，

康炳麟后改名为康明远，王延龄、郭喜良、郎道衡等，此外还有王莲桂（盛世才自己允诺其来新疆，后为盛之特务）和某（名子已忘记，未到新疆来）等人。盛因郭失败被杀，故敌视张，在日本为反对张学良的御用组织——辽宁省留日学生同泽俱乐部，盛组织了开原留日学生同乡会，被推为会长。一因盛世才有眷属（邱毓芳在日本女子大学学习），在日本租了一幢宽绰房子，做饭、开会都方便；又因盛伪装进步，开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正和大家求进步的愿望相合，所以那时星期日常到他家聚会，以会的名义，油印过小册子，揭露同泽俱乐部每月给电车票若干拉伕入其组织的丑恶手法，来瓦解同泽俱乐部。当时除王莲桂及邢某外，大都思想左倾，有的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如何耿光、宋念慈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东京补习日语和在第一高等学校特设予科学习共二年，就到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去了。

盛世才由陆大毕业后，即赴南京见蒋，蒋派盛在参谋本部供职。蒋北伐时，盛曾任北伐军参谋处的作战科长，返南京后，仍就原职。盛以学历资深，未得重用，郁郁不满，恰巧新疆金树仁派鲁效祖到南京物色军事人材，盛欣然应聘赴新工作，随即携妻女来新。盛到新疆后，金树仁本拟与以兵权，而金树仁之五弟（金的军务厅长）竭力劝阻，说：盛世才材高志大，不能不加以防备，于是仅给以参谋职务，备而不用。马仲英第一次到新疆和随后哈密维族起义，鲁效祖和张子亨先后任东路剿匪总指挥时，都向金树仁请求派盛随军前往，否则拒不奉命。金不得已乃派盛任指挥赴东路迎敌，两次虽均凯旋归来，但仍回任原职参谋，盛忍耐待时，

并未作任何表示，这是他虚伪至极的地方。马仲英二次到新疆，长驱直入，直袭奇台，金树仁大惊，乃以两个团交盛指挥以迎击马仲英。盛率兵走后，张馨、陈德立、赵德寿、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联合白俄归化军，发动政变，将金逐出城外，金在红山嘴暂住，调集西路军马来乌鲁木齐反攻。这时盛行军途中闻讯赶回，驻扎在乌鲁木齐东门外，本拟和金联络以处理政变，这时西路军攻城甚急，归化军只有两个连，势单力孤，都收拾好自己东西，准备装车弃城逃跑。张馨、陈德立等乃求救于盛世才，说：将金逐走后，盛可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盛以夺权在望，乃允诺之。但其率领的两团兵，都和盛无深切关系，能否如意指挥，尤其是推翻金政权，能否参加，尚属疑问。盛亦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饵，向来新的东北义勇军求援（苏炳文部下，由郑润成率领）。但郑说：我们不久居新疆，不能介入新疆争端。盛乃转而向郑借兵一用，讲明事成即还（郑系苏炳文的副官长，率领苏部五百余人，盛夺权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郑监禁而后杀之）。郑认为都是东北同乡理应帮助一臂之力，但虑无武器，盛说：武器由我来准备，只要上城墙一露面，不用开火，事情就可以解决。商妥后，盛返回驻地，先召集两团的军官开会，即扣留在院内；院外两团士兵则被命整队架枪，这时已准备好的义勇军即时拥前夺取枪枝。于是武装了的东北义勇军登上城墙，向外喊话，西路军看到城墙上已不是归化军而是汉族人，都说是自家人，还打什么就撤退了。金树仁以西路军马不再攻城，又听说盛世才和东北义勇军联合起来，认为大势已去，就率其亲信经由苏联跑向南京。于是盛世才就抬得了“新疆王”的权位。但东路告急，盛不得不草草安

排一下政局，率领军队东下，当和马仲英部遭遇紫泥泉子，正值黑夜，天又阴雨寒冷，马仲英部衣着单薄，不能御寒，两军先头部队都冲到敌人后方，马部曾由盛的指挥部旁经过，如果发觉即可俘获盛世才。盛的先头部队是另一支来新的义勇军，原为东北土匪刘快腿和其义子吴大虎率领的部队，凶猛异常，反复冲杀，马军乃败退，造成了盛世才稳坐“新疆王”的局面。马仲英部当时退向吐鲁番，休整部队，再由南路进攻乌鲁木齐。盛返回乌鲁木齐后，便着手巩固其统治，逮捕了郑润成和当时的省主席刘文龙，自任边防督办，以张馨为教育厅长，陈德立为财政厅长兼外交特派员，赵德寿为塔城行政长。陈中、李笑天、陶明樾等均被盛杀害。政局稍安后，马仲英又从南疆杀来，达坂城一仗，盛败下阵来，马仲英部进逼乌鲁木齐，团团围住。正在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盛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别无良策，只有请苏联援助一途可走，盛乃携其翻译官振翰亲赴苏领馆，请求苏联出兵援助，经允诺后，苏军便以阿勒泰归化军为名，经由塔城入境，支援乌鲁木齐。马仲英知道敌不过苏军，便被逼逃往南疆，并去苏联学习，其残部由马虎山率领退到和田驻扎。于是乌鲁木齐之围乃解。

马仲英年轻志大，思想激进，所以在他军内，用有杨波清、刘佛吾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且杨波清负西北军事责任。那末为什么苏联选择盛世才，把他扶植起来，而摒弃马仲英呢？一是马系外来的，在新疆人眼中马是流寇，接受了蒋介石的暂编三十六师的番号，和蒋有某种联系；二是盛已取得政权，威信较高，且能说一套马列理论，一般大小事都先和苏领事磋商而后施行。但苏联仍留一手，防备盛世才有

变，让马仲英去苏，备而不用，令其部下由马虎山率领退驻和田，目的是牵制盛世才。

盛拾得政权之初，苏领事建议由苏联派二十五人的各族联共党员来新辅佐盛世才。盛虽允诺，但心中另存别图，那就是邀留日开原同乡会的诸人来新帮助他。他认为这些人比较可靠，所以他写信给徐伯达，要他代邀。徐接信后，便分别通知前述九人（何耿光、宋念慈是共产党员，因联络点被破坏，返回原地又找不到组织，与组织断了联系。徐伯达、王乃中、程东白、康明远、王延龄、郭喜良、郎道衡，再加上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开原同乡崔果政共十人，后被新疆老官僚们讽称为十大博士）。大家认为到新疆后不但有官可做，且有到苏联去镀金的机会，乃同意去新疆，当即和盛世才的驻津代表张元夫联系，经盛世才批准，领了路费即首途赴新。当时绥新长途汽车公司刚成立，尚未通车，又兼等候宋念慈（他在黑龙江、路远尚未到津），所以商定：徐伯达、王延龄，崔果政及宋四人候车同行，余外六人则经由日本、海参崴、西伯利亚铁路先去新疆。因为盛世才已通知苏领事有六人经苏联转道来新，请其关照，所以这六人在苏联境内顺利通过。过日本时，这六人都装做不懂日语，是新疆在北京念书毕业回家的学生，也顺利通过，日本便衣警察白白跟了好几天（当时满洲国已成立，从东北经满洲里入苏联境内，虽然可缩短路程，但比较危险）。我们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到达乌鲁木齐，因为绕道路远，又在塔城候车半个月，所以到乌鲁木齐时，徐伯达等四人反到乘绥新长途汽车，后走先到了。我们到齐后，盛世才便开始给我们分配工作。

先是盛和苏联领事商定，在当时的新疆现阶段实行六大

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并组织反帝会（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以宣传和推行六大政策。另外盛着手设立政治监察总管理局，以包果娜（女、苏联派来的）为顾问，王立祥（苏联派来的）为秘书长，新疆军校毕业盛的学生王玉书为局长，李某（也是军校毕业的）为军事科长，程东白为国际科长，王延龄为政治科长，郎道衡为民事科长。每科最先只有密探一二人，虽然每天都有材料报告，但大都临时想的，多属不实，藉以应付差事罢了。程东白和我对此颇感烦厌，由于对苏上达案件的疑问，便怠工起来，王延龄则安于其职。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月成立了反帝会）调程东白为迪化地方法院院长，调郎道衡为省立师范校长。这时徐伯达已任新疆省银行行长，郭喜良为督署运输处长（由原汽车局改组成的），新设立的交通处处长由康明远充任，新设立的政训处处长由宋念慈充任，王乃中为迪化市政筹备处处长。崔果政为中学校长，何耿光（在盛眼中认为是我们的头头）为俄文法专（后改为新疆学院）校长、反帝会秘书长，盛自为会长，各部部长均由上述十人中充任。

苏上达和高惜冰都是东北人，先于我们到新疆的，他们虽然不是南京派来的，盛以同乡关系，特准他们到新疆来，但证诸后来高在东北任要职是劫收大员和苏被释后即去重庆的情况，可知他们与蒋可能有某种联系。高惜冰当了建设厅厅长，苏上达当了省银行行长。当时汽车局长刘守仁（东北义勇军来新的，通俄语），以银行伙食好，常去银行吃饭，和苏上达常来往。政治监察总管理局成立后，由盛指示制造苏上达案件，其目的：一、让苏联知道他决不用南京的人；二、怕日久苏、高尾大不掉危及他的政权；三、给副职的徐

伯达和郭喜良谋升正职，他直接和王立祥密谋派人到银行买枪，苏上达买了给银行警卫用，但事先未向盛请示或报告，且刘自己也有手枪，便说他们阴谋武装叛乱推翻盛氏政权，予以逮捕，这事事先王局长都不知道。那夜，盛世才召集了我们到督办公署，说明买枪枝事完了，就分派王立祥、徐伯达、王延龄和李科长去银行逮捕苏上达，王局长、郭喜良、程东白，郎道衡去汽车局逮捕刘守仁。因为他们都有枪，所以又由他的卫士队派卫士四人每组二人持枪协助。我们这一路到汽车局时，刘已睡下，由郭喜良出名，请刘起来有要事商议，刘起来后到了办公室刚坐下，卫士则夺门而入，举枪向刘，大喊举起手来，随即解下其腰间的短枪，并向刘宣布：奉督办的命，特来逮捕你。回到督办公署后，盛即令我们分组审讯，我们仅知道买枪经过，而刘则一无所知。审讯无结果，而苏上达只承认未事先请示的过错，绝无其他用意。其后，苏、刘被押多年，再也没受过审讯。我和程东白参加逮捕审讯工作，对苏上达案件发现很多疑问，终于助长了不干特务工作的决心。

盛世才开始时励精图治，自奉俭约，他留我们吃饭都是家常便饭。他每天下午下班后，率领他的卫士，在督办公署前面栅院打篮球，过往行人扶栅栏观看，他也不驱赶。有时在大街散步，表示和旧官僚大不相同。制造苏上达案件以后，他就不再打篮球或步游大街，出门时，多半是到苏领馆，则乘汽车，前后都有卫士坐车跟着。以上这些故意为之的虚伪行动，都是为他的“新疆王”位加固基础。

但在推行六大政策中，关于清廉和禁烟工作，做得很彻底，这不能不算是他的政绩。先制定了肃清贪污和禁烟条

例，严格执行。新疆地理环境也帮助了他。不经他批准，任何人也不能离开新疆或进入新疆。东西两路边卡卡得严，何人也难通过。所以贪污者终逃脱不了被法办，烟土来源断绝，自然无人吸鸦片烟了。按贪污五百元以上就处死刑的规定，他枪毙了呼图壁县长徐文彬，使人人惧而不敢贪污。雷厉风行一时，贪污和吸毒彻底禁绝了。在禁烟方面，在反帝会内设集体宿舍，凡是吸烟的公务人员都到那儿食宿戒烟，每天按时发给烟药，都很快断瘾了。但正是讲清廉和禁烟的盛世才自己，后来竟吸烟和大肆贪污起来，警务处没收的大批烟土专供他吸用。他去重庆时带走了数万两黄金，能说不是贪污得来的？！

盛世才制造了苏上达案件以后，新旧两派人士都感到震惊。我们曾托副官长赵剑峰（东北义勇军来新的）代为备办酒席，以答谢旧派人士的多次欢迎酒宴，请客单送达后，谁敢不到，但宴席上人人侧目，本来为的是联欢，但欢不起来。他们以为苏上达案件是我们制造的，是我们的下马威（其实是王立祥的下马威），两派的疑意实系盛一手制造成。当时在盛的统治下，如陈德立、张馨、冯梁（督署军法处长）、黄翰章（督署经理处长）、师世昌（督署秘书长），桂芬（迪化行政长）等都是杨金时代的老人物，新派人士就是老人物所讽刺的十大博士和马仲英部下投降过来的杨波清、刘佛吾、尹建威等。其后高惜冰也感到危险，托故辞职去南京，盛世才放走了他。至于苏上达和高惜冰与蒋家王朝有什么联系，其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三五年苏联派来的二十五位各族联共党员如：王寿成（原名于秀松）、王宝乾、万献庭、郑义均、张义吾、吴德铭、

哈的尔等陆续到新，但各机关高级职位已为新旧两派人士所占据，无处分派，只有反帝会秘书长一职，苏领事及盛均认为是要职，不能不让出。于是何专任财政厅付厅长（先是陈德立为拉拢新派，向盛恳请何担任付厅长，经盛允诺）将反帝会秘书长和新疆学院院长让给王寿成。盛世才为拉拢王寿成并向苏联表示忠诚，将其妹盛世同嫁与王寿成。王宝乾为奇台县县长，后又任喀什行政长，吴德铭为运输处付处长，张义吾为保安局（前身是政治监察总局）局长，郑义均为和田行政长，万献庭继王宝乾为喀什行政长，哈的尔为喀什保安局长等。在他们来到之前，盛世才召集我们讲话说：对苏联来的人一定要搞好团结，谁要是搞不好团结，谁就犯绝大错误。自然我们是注意遵办的。

于二十五人之外，苏联还派有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帮助盛世才决策。只以二十五人未得要职，苏联领事便不时催盛快想办法，盛乃决定将我们调外区县工作。何耿光为塔城区教育局局长兼报社分社长，郎道衡为喀什区教育局局长兼报社分社长，周春晖为阿山区教育局局长兼报社分社长，索文林为伊犁报社分社长，赵曾省为阿克苏区教育局局长（周、索、赵均系东北人，由我介绍来新的左倾分子，被旧派讽称十小博士中的几个人）。此时徐伯达已代替宫振翰为喀什行政长（宫是东北义勇军来新的，通俄语，为盛做过翻译，曾任《天山日报》，后改《新疆日报》的社长，因参予过盛氏的机密，故第一批就被捕押，后被杀死）。又以“县政是基础”的名义，派康明远为绥来（即玛纳斯县长），宋念慈为乌苏县长，刘佛吾为昌吉县长等。但苏领事仍不罢休，为了制造口实把我们捕押起来，使盛受不到我们的影响，使其二十五人能架

空盛世才，竟诬指我们留日同学为日本间谍。后来盛世才由于需要，终于把我们先后捕押了。

陈德立虽然通俄语，但盛世才不信任他，所以不常为盛做译员，宫振翰虽参加过秘密商谈，但最重大的决策和机密，他也不被邀参加翻译，且领馆里有通汉语的秘书，还有王立祥也是可靠的译员（王立祥到新后不久就被商人认出来，他的个儿矮，站着和人家坐着一般高，有这个特征，就容易为别人认出，因为商人们在外蒙做买卖时见过他，他那时在外蒙搞情报工作，都说王立祥是苏联由外蒙调来的）。

盛世才为了买飞机大炮，向苏联借了五百万金卢布，苏联逼他还债并为其出主意：如果逮捕社会上知名人士，没收其财产，还债是用不完的（确如其言，逮捕胡赛音巴依就没收了二十七煤油桶金子）。正在此时，盛世才抓住了当时的机会，邀请中共同志来新工作。在盛以为旧派人士终究要除掉的，把我们押起来，也合乎苏联的愿望，押社会上知名人士可得大批财物，把我们押起来，就有口说王寿成等二十五人都是托派，在新疆没搞好团结，而把他们赶回苏联，以抵制苏领事为二十五人谋得要职，以架空盛世才的阴谋。而且他认为监押驱逐了这几部分人，还有中共同志为他撑台，于他的王位无损。便下决心大逮捕，文的凡是各机关头头，武的团长以上，王公喇嘛，资本家、地主无一幸免，截至一九三七年底，大约在全疆共捕押了十万人。在乌鲁木齐原有的督办公署内的特监和西门里的旧监狱住不下，便把蒙族满汉王府、刘文龙公馆、警务处（前身是保安局）的汽车房子和王爷庙后院均改为监狱，但仍有人满之患。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盛世才两次遭到真正的武装夺取他的统治权。一是维族师长麻木提，一是马虎山。这两次都是英副领事策动的。原来英领事系军人，由印度英军派充的。一九三六年南京英大使馆派一个副领事，这个家伙非常神气，带有中国人的厨师和摆台的，他下车伊始，即大摆酒宴，集体宴请以喀什行政长、喀什警备司令为首的各机关头头，而后又分别宴请各领导人，极力进行他的分化挑拨伎俩。果然麻木提师长，以为有靠山，就策划举兵反盛，他叫大毛拉窝甫尔发动群众，窝甫尔不干，他一怒暗杀了窝甫尔。至于他的部队四个团，只有第一团听他的命令，他感到孤家寡人，大势已去，便率亲信逃往印度。这次是盛先有予防，如调训其团长到乌鲁木齐受训等，使麻木提谋反不成。英副领事一计未成，于一九三七年窜至和田，教唆马虎山谋反，马虎山此时亦静极思动，便分兵两路：一指库车，一攻喀什。库车一路为盛的两个团和军校学生所阻。喀什方面由马生贵旅长率领，先占据了疏勒城西的飞机场，然后攻陷疏附县。当时喀什警备司令部，仅有守飞机场的一个连和一个城防中队，兵力单薄，不得不退守疏勒县城，于是疏勒被围达三个月之久。后来盛请苏联出兵到喀什，马生贵投降，疏勒始解围。马虎山看到喀什一路已投降，在库车又不能前进，自觉反盛无望，也率其亲信逃往印度。这两次反盛事件表明了英、苏在新疆的暗斗，英国失败了，盛世才的王位保住了。

于是盛世才便发动了大逮捕，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调回乌鲁木齐任教育厅编译委员会（编译小学教科书）委员长，同行的有视察喀什财政的财政厅副厅长胡寿康，到了

达坂城，我们乘坐的汽车，被领到警察分局院内，进行搜检，盛世才发给我使用的手枪和电报密码本都没收了。胡则被扣留，也就是被逮捕了。我则被放行，回到乌鲁木齐，次日我面见了盛世才，他说：想你已经知道他们（指留日同学）被我抓了起来，他们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们有他们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不必为他们担惊受怕，你好好搞你的工作。他对郭喜良也是这样说的。明明是监狱尚未准备好，逮捕了无处监禁，偏硬说与你无关，意思是不准备逮捕我，说假话果真是大人物的必须会的伎俩吗！我看他是一贯虚伪成性的。过了两三天，我和郭同一天被捕了。至此除王延龄外（王在伊犁保安局任内，为盛的岳父任伊犁屯垦使的邱宗濬所捕押后解到乌鲁木齐的，因王与邱意见不和），我们都被押了，老官僚们已都一网打尽了。

拉完磨杀驴子，杀人灭口，是盛世才一贯手法。他认为只要保住他的“新疆王”位，什么都可以利用，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他都信，也都不信。他认为别人应该而且也能为他做工具，他认为可以利用中共来新的同志为他撑台，便决定逮捕我们并驱逐那二十五人回苏联。就连他的妹夫王寿成也被赶了回去，盛世同不愿随王去苏，他不答应，逼她去，最后盛世同还是没有去。可见连他的胞妹，他都利用，旁人更不待言了。第一次大屠杀就杀死了被押人三百多，老官僚们都变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杀了这些人为了的是灭口，以便转而投靠蒋介石。他认为中共不可能打败蒋介石，而莫斯科被围紧急，不能再继续依靠苏联。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他计划捕押中共同志。但重庆一时尚不能派人来，无人撑台不行，因此他让我们暂时出狱，给他